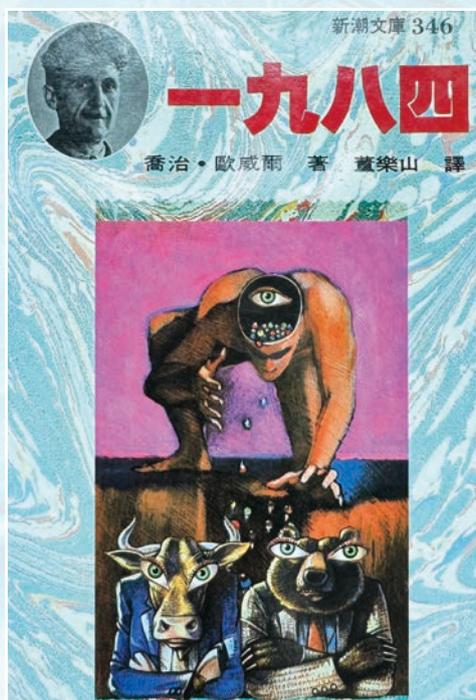


老大哥的幽靈： 重讀《一九八四》

成大歷史學系退休兼任教授 王健文 2025/5/4



一、彷彿若有光

經典的價值在於每一次的閱讀，都能看到閱讀的當下，屬於讀者自己的此時此地。

1973年的夏天，國中一年級結束的那個暑假，到學校上暑期輔導課的第一天，吳老師抱著百多本書，要同學每人至少帶一本回家閱讀，我卻被指定了四本書，分別是捷克作家穆納谷的《權力的滋味》、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反烏托邦經典《一九八四》、日本學者早川的《語言與人生》、語意學家何秀煌的《記號學導論》。

吳英長老師帶給我少年時代第一次深刻的啟蒙經驗，他只教了我一年，對我的影響卻是一輩子的重量。是他第一次告訴我什麼是多元與寬容，建立了我在邏輯思辨上的基本能力，提醒我反省習以為常的世俗價值，思索每個人存在的獨特意義。

那時讀這些書，多半似懂非懂。因為知識積累不足、生命閱歷有限、思辨能力仍待啟發，年少時閱讀經典難免茫然，有時為賦新詞、強作解人。但是經典千門萬戶，讀者即便懵懂，總也開了幾扇窗，透見些許微光。

出身捷克共產黨高層，曾入圍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有紅色海明威之稱的捷克作家穆納谷（Ladislav Mnacko），大約在1965-6之間完成《權力的滋味》（*Taste of Power*）的小說創作，描述一個勇敢正義而大無畏的革命者攀登權勢高峰之後，從獻身的革命家，異化為自命為革命化身的獨裁者。當「人能弘道」，轉變為「道能『弘』人」時，革命者的「肉身成道」（我獻身於正義），就成了革命的「道成肉身」（我就是正義），就在那一刻，革命翻轉成為反革命。

這些當然是現在重讀《權力的滋味》的體會，十三歲讀穆納谷，只能在最簡單明白的反共教條下，有感於共產體制的荒誕腐敗。當時我無從認知自身所處的威權體制，更不可能辨識民主化以後蠢蠢欲動的新威權的可能。

十三歲讀歐威爾（G. Orwell, 1903-50），同樣地，我只是將書中描述現象投射到鐵幕下極權的共產世界（當然，這的確是歐威爾創作本書的基本參照），既不知道臺灣的戒嚴體制，更不曾聽聞民主世界中的麥卡錫主義。少年時對世界的認識很簡單，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判然，世界被劃分成正與邪、白與黑兩半，就像月球的陰晴兩面，半個世界永遠光明、另外半個世界則是無盡的黑暗。

二、除魅與再蒙昧

再一次閱讀《一九八四》是個奇妙的機緣。1984年的2月，正好就是歐威爾預言的那一年。齊邦媛老師為台大歷史所與中文所合開的高級英文課程，兩個學期各讀一本英文小說，上學期讀馬克吐溫，學期末，齊老師說，下學期我們就來看歐威爾的《一九八四》吧！

狂飆的1980年代，重讀36年前歐威爾這本半紀實半預言的反烏托邦經典小說，年少時對「國家」與「領袖」無可置疑的崇敬一掃而空，反抗的青春歲月，面對真理了無疑惑，特別是在威權體制鬆動即將解體的當頭，我們自以為是代表正義的科學小飛俠，對抗著那時當權的惡魔黨。仍然是黑白分明的

世界，只是少年時仰望的朗朗陽光，現在成了黑暗的深淵。

神魔簡單二元對立的政治認識，其實正好是歐威爾反烏托邦預言的滋生土壤。正如同大洋國之外永遠需要個（永遠征服不了，因此永遠存在）敵對的歐亞國（或東亞國），大洋國之內，老大哥永遠需要反黨集團（永遠無法繩之以法，因此也永遠存在）的邪惡領袖。神魔相生，沒有魔鬼的存在，無從樹立神聖的偉大領袖。

後來才知道，我那除魅的青春時刻，不自覺地蒙上了新一層的魅影。

三、永遠需要惡魔黨，也需要變節者

賀佛爾（Eric Hoffer）在《群眾運動》（*The True Believer*，我用的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版且文的譯本，1969年水牛版王尚義譯本書名直譯為《真實信徒》）中敏銳地指出：「群眾的興起和傳播可以無需信仰一個上帝，卻絕不能不相信一個魔鬼。」賀佛爾又說：「有人問希特勒他是否認為應該把猶太全部加以毀滅，他回答說：『不要……那樣我們勢須另外創造一個猶太人，要緊的是要有一個實體的敵人，而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敵人。』」

上帝可以是抽象的，敵人（魔鬼）必須是實體的。對魔鬼的仇恨是煽動群眾情緒的最大動能。小說中時時進行的「兩分鐘仇恨」，必須成為日常，反覆烙印恐懼與仇恨。當大洋國的敵人是歐亞國時（可驗證的記憶中歐亞國是永遠的敵人；但是當敵人轉換成東亞國時，所有歐亞國是敵國的記憶立刻全盤清洗，東亞國取代成為永遠的敵人），仇恨的對象就是歐亞國，以及與歐亞國勾結的大洋國內變節者。

仇恨情緒要拉到最高，必須與外部敵國永遠處於戰爭狀態中，戰爭組構了簡化的敵我二元對立框架，也釀製了激盪人心的危機情境。對領袖（或黨）的無限忠誠以及對異己者的強烈仇恨，都仰賴著外有魔鬼、內有與魔鬼勾結的變節者的戰爭情境。

「黨所要求於其黨員的是智力的分裂，這在戰爭的氣氛中比較容易做到。」 203

戰爭情境必須永遠維持，因此打不倒的魔鬼與滅不完的變節者也始終存在。如果打倒一個魔鬼，必須有另一個魔鬼即刻取而代之；消滅一個變節者，也需要有(或者製造出)新的變節者前仆後繼。

為了魔鬼與變節者的永遠存在，他們只能是標籤式的存在，不能是出現在真實日常中，因此隔絕外界、特別是被標誌的敵國是必要的：

「除了戰俘以外，大洋國普通公民從來沒有見到過歐亞國和東亞國的一個公民，而且他也不得掌握外語。如果他有機會接觸外國人，他就會發現，外國人同他自己一樣也是人，他所聽到的關於外國人的話大部分都是謊言，他所生活的封閉天地就會打破。他的精神所依的恐懼、仇恨、自以為是就會化為烏有。……主要的疆界，絕不能越過。」 207

維持敵我疆界，徹底斷絕一切溝通彼此的橋樑，沒有縫隙。接下來，內部的思想控制，能夠在資訊壟斷的情況下完全掌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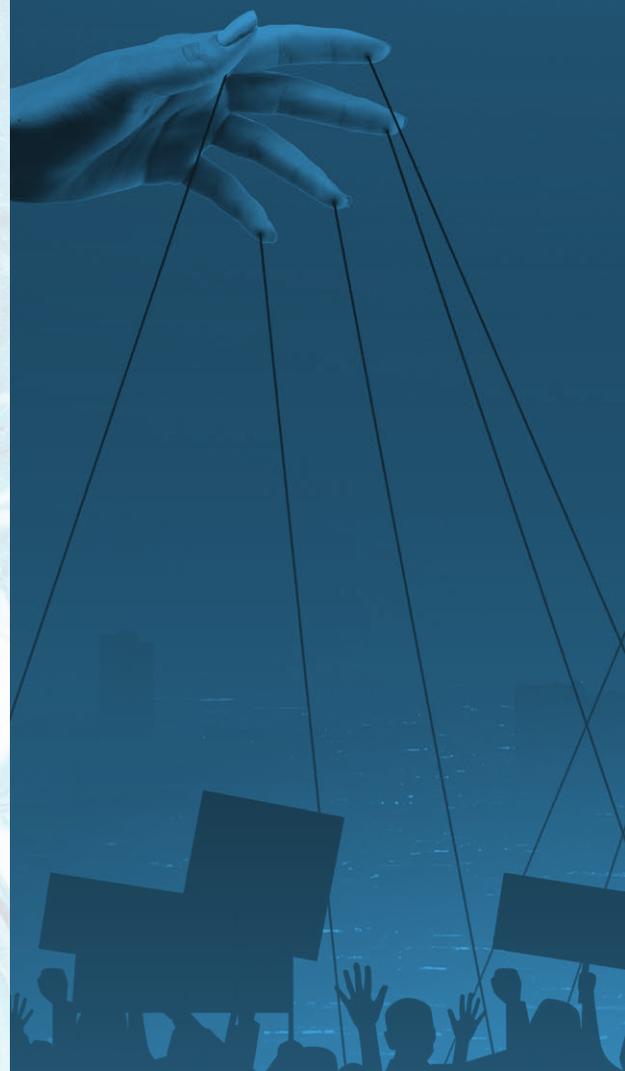
四、語言的貧乏與思想的貧困

大洋國的思想控制，一方面通過歷史記憶的不斷清洗與重寫，另一方面則通過新語言的鑄造。

過去延續到現在，現在指向未來。未來的想像願景賦予現在權柄，而現在的正當性取決於過去。對掌權者來說，重要的並非「過去」「是什麼」，而是過去「應該(必須)是什麼」。英社的信條是：「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，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。」 46 歷史的話語權不是來自論辯，而是取決於誰掌握權力，誰能夠憑藉權力操弄記憶。

真理部負責清除真實的過去，同時製造當下所需要的「過去」，即便人們記得某件事實，但沒有任何可見的記錄來印證，它就不會是「事實」，也不會存在人們的「記憶」。

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記憶以外不存在任何記錄，那你怎麼能確定哪怕是最明顯的事實呢？ 47



「新話」(或譯「新語」)則是進行語言的改造，簡單的語言，無從展開複雜的思維，語言的貧乏，造就思想的貧困。

「新話的全部目的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？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，因為將來沒有詞彙可以表達。……詞彙逐年減少，意識的範圍也就越來越小。……語言完善之時，即革命完成之日。」⁶³

思想的貧困除了語言簡單化之外，更在「雙重思想」的詭辯式操弄中，歐威爾另外一部反極權的諷刺小說《動物農莊》(*Animal Farm*，1945年出版)中膾炙人口的一句話：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，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。正好說明了《一九八四》所謂的雙重思想。

「平等」如果是真正的價值，應該是具時空普遍性，放諸四海皆準、垂諸百代不惑。但是雙重思想藉著將價值差別化，「平等」就有了種種前置的條件：因時代而有別(這時代可行那時代不可行)、因地域而有別(此地可行彼地不可行)、因身分而有別(這種人可以那種人不可以)、因情境而有別(特殊情境下不平等才是「真正的」平等)。

像這般條件式的價值矛盾如何成立？小說中如此表述：

「同時持兩種相互抵銷的觀點，明知他們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，用邏輯來反邏輯，一邊表示擁護道德一邊又否定道德，一邊相信民主是辦不到的，一邊又相信黨是民主的捍衛者，忘掉一切必須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時候想起它來，然後又馬上忘掉它。」⁴⁷

「自由」、「民主」的價值內涵，有著基本的常識性概念。「自由」如何「反自由」？「民主」如何「反民主」？或者倒過來說，如何以「限縮自由」來「保衛自由」？如何以「否定民主」來「捍衛民主」？這恐怕不只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倫理問題，更是對概念與價值的直接顛覆。



五、自由就是回歸人性與常識

極權體制最終的手段就是對人性徹底的抹滅。溫斯頓對裘莉亞說：「我不是說招供，招供不是出賣，無論你說的或做的是什麼都無所謂，有所謂的是感情，如果他們能使我不再愛你——那才是真正的出賣。」¹⁷⁷

人與人之間最單純而真實的情感，才是人性最本質也是最後的根據地。但是，當極權精準地打擊了每一個人內心最恐懼最脆弱的所在，最終，溫斯頓出賣了裘莉亞，裘莉亞出賣了溫斯頓。

被逮捕之前，溫斯頓曾經在他們躲藏的小屋，如同小說中那玻璃紙鎮象徵的逃離現實的純淨世界中，經常聽著屋旁無產者(非黨員的一般人民)婦女自在歌唱，歌唱內容不外男女情愛時的曖昧、不安與感傷，他曾經這麼想：

「但是在兩代之前的人們看來，這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。因為他們並不想篡改歷史，他們有自己的不加置疑的愛憎作為行為的準則。他們重視個人的關係，一個完全沒有用處的姿態，一個擁抱，一滴眼淚，對將死的人說一句話，都有本身的價值。……他突然想到，無產者仍舊是這樣。他們並不忠於一個政黨，或者一個國家，或者一個思想，他們卻相互忠於對方。」¹⁷⁶

他有感而發：「無產者是人……我們不是人。」¹⁷⁶

回歸最天真素樸的人性，回歸最簡單易懂的常識，是破解極權操控的簡單道路。溫斯頓與裘莉亞的一段對話，說明了這個道理：

「『你記得嗎？』他問道，『那第一天在樹林邊上向我們歌唱的畫眉鳥？』

『牠沒有向我們歌唱，』裘利亞說，『牠是在為自己歌唱。其實那也不是，牠就是在歌唱罷了。』

鳥兒歌唱，無產者歌唱，但黨卻不歌唱。……如果你能像他們保持身體的生命一樣，保持頭腦的生命，把 $2+2=4$ 的秘密學說代代相傳，你也可以分享他們的未來。」²³¹

「所謂自由，就是可以說 $2+2=4$ 的自由，承認這一點，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。」⁹⁰

六、老大哥無所不在

徐復觀曾經一語道破民主社會的迷思，如同我自己年少青春時所認識的世界，共產極權與自由民主，像是月球陰晴兩面，清楚明白地將世界剖成兩半：

「今日有許多人以為一說社會主義便是極權，只有資本主義才是民主……民主政治的本身，不黏貼著某一特定的主義或思想的內容，而是在建立一個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主義或思想的政治形式。在政治領域中，此一自由選擇的形式是第一義的，任何思想主義都是第二義的。」(徐復觀，〈學術與政治之間〉，收入：《學術與政治之間》)

徐復觀一生堅持儒家自由主義本色，他嚴辭批判彼岸紅色中國的共產極權，對此岸以自由中國民主陣營為名的威權體制也不假辭色。他清楚認識到，要穿透外在黏貼標籤的自我宣稱、拆穿以主義或集體為名的任何意識形態，檢視其內在本質是否符合自由民主的普遍價值。不論抬出表面如何崇高的目標願景、宣稱此刻如何急切的危機情境，只要普遍價值被特殊化、差別化，就是這價值的背反。

老大哥不只在想像的大洋國，不只在1984年，也不會只在現實中被清楚辨識的威權國家。只要權力人物不知節制，人們放任權力肆無忌憚；只要普遍價值被特殊化，人群基本權利因身分被差別化；老大哥就在我們身邊，老大哥的幽靈無所不在。

本文徵引《一九八四》皆依董樂山譯，志文出版社1991年「新潮文庫版」，引文後標註該版本頁數。